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70

2007年10月11日

蘇維埃還是立憲會議？

—— 論十月革命新政權的合法性和民主性

杜建國

在當代，實行以普選制和黨派自由為核心內容的國民議會制度，即所謂的現代民主制度，通常被視作一個政權具備合法性的基礎。按照這個標準，為我們所熟知的蘇聯政權——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統治，肯定是缺乏合法性和民主性的。對於這一政權的合法性和民主性的缺失，人們普遍認為這直接肇始於或根源於，十月革命後不久，經普選產生的立憲會議拒絕接受布爾什維克新政權，而新政權則違背民意，取締了立憲會議（原罪還可以更遠地直接追溯到所謂的布爾什維克的集中的先鋒隊理論——儘管這種理論並不存在，至多可以說只是在短期內並只在很微弱的程度上存在過）。本文的任務，就是來檢驗一下這種觀點到底是否符合

歷史事實。

在此首先必須要確定，十月革命後的新政權到底為何？通常人們都會說新政權是布爾什維克政權，這並非毫無道理，但並不準確，這種觀點——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的——忽略了蘇維埃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嚴格地說，準確地說，新政權不是布爾什維克政權，而是蘇維埃政權——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大會。儘管布爾什維克是蘇維埃的執政黨，但是也不能將二者等同。由於斯大林時代蘇維埃形同虛設，名存實亡，革命初期蘇維埃的獨立性和重要性完全被人們忽略了。將二者混為一談後，探明歷史真相的努力實際上一開始就被引入歧途了。

對於前面列舉的那種觀點來說，解散立憲會議就意味著，取而代之的蘇維埃政權內部毫無民主性、合法性可言，與斯大林官僚統治等同。或者，即使沒有立即如此，那麼蘇維埃也將必然地逐漸地發展為官僚統治。果真如此嗎？筆者認為並非如此，儘管解散了立憲會議，但是蘇維埃政權與後來的官僚統治仍舊有著本質區別，而且也不存在著逐漸蛻化為官僚統治的內在必然趨勢。相反事實證明，蘇維埃內部不僅繼續保留著民主，而且甚至將民主制昇華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下面請讀者跟隨筆者重溫一遍俄國革命的歷史，也就是蘇維埃的歷史，我們將不難發現，到底哪一種觀點才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俄國革命，通常被稱作社會主義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這都不能算錯，但都過於籠統。應該更為明確地稱之為蘇維埃革命，正是蘇維埃賦予了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這些抽象概念以具體的內容。

蘇維埃，是俄文“委員會”一詞的音譯。蘇維埃，首先和主要是指工人代表蘇維埃，即工人代表委員會。工人代表蘇維埃最

早誕生於 1905 年革命期間。在“正常”的社會秩序下，無產階級群眾是消極的，同時也是分裂的。有組織的工人群眾分屬於不同的黨派和工會，另外還有大量的工人或者說更多的工人不參加任何組織。除此之外，分裂還因為行業、部門等因素而產生。無產階級革命，首先意味著工人群眾從“正常”的消極被動狀態轉為採取直接行動干預或創造歷史進程的積極主動狀態，同時也就意味著由四分五裂而轉為共同行動。新的更高級的運動必然需要新的更高級的組織形式。革命高潮或革命危機來臨後，自然產生了用何種組織方式促進統一行動的需要，蘇維埃因此而誕生。蘇維埃囊括所有工人在內，使無產階級擺脫了日常的種種束縛，真正聯合成為一個整體。蘇維埃代表經工人直接投票選舉產生，在工人群眾中具有絕對的合法性和權威性。蘇維埃的出現，有力地促進了革命的深入發展。

1905 年革命期間，在群眾罷工的浪潮中，第一個工人代表蘇維埃大概誕生在工業城市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首都聖彼得堡的無產階級成立蘇維埃後，產生了鉅大的影響。隨後各地工人開始紛紛建立自己的蘇維埃。儘管當時聖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只存在了短短的 50 餘天，但是它已經具備了工人政權的雛形。時任聖彼得堡蘇維埃主席的托洛茨基宣稱，下一次革命來臨後，蘇維埃將遍佈俄國城鄉，各地的蘇維埃將聯合為一個整體，無產階級將通過蘇維埃來完成自己的解放。¹ 隨著蘇維埃被取締和革命進入低潮，沒有幾個人再重視這一預言。

但是無產階級並沒有忘記這一點。1917 年二月，彼得格勒（二月革命後聖彼得堡更名為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群眾完全憑藉

¹ 伊薩克·多伊徹：《先知三部曲》第一部《流亡的先知》，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年，第 165~166 頁。

自己的力量推翻了沙皇。依據 1905 年的經驗，推翻沙皇後群眾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再次組建蘇維埃——工人和士兵聯合代表蘇維埃。各地農民也跟著建立起自己的蘇維埃，並與工兵蘇維埃進行合作。群眾現在有力量，有組織，惟獨還欠缺獨立明確的目標和意志，欠缺由自己掌握政權的目標和意志，因此他們沒有立即用蘇維埃來代替沙皇政權，而是容許資產階級出面當政。

在徵得蘇維埃的同意後，資產階級才敢另外組建了臨時政府。臨時政府以沙皇被推翻前的最後一屆杜馬為基礎組成，並不具備一個廣泛的民衆代表機構的資格，更像是一個賢達政府。一邊是無產階級的蘇維埃，一邊是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一邊是活躍的和有組織的群眾，一邊是驚魂未定的資產階級，這樣就形成了雙重政權並存的局面。一國不容二主，這種局面是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的。一旦群眾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有多麼鉅大，那麼誰也不能阻止他們憑藉這一力量掌握政權。另一方面，資產階級也千方百計地企圖扼殺蘇維埃，摧毀群眾的力量，恢復“正常”秩序。

既然工人士兵群眾現在還缺乏足夠的認識，那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等反對蘇維埃獨自掌權的妥協黨派就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佔據了蘇維埃的多數。對於各黨派，為便於理解，可以牽強地作如下區分：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是工人社會主義者，其群眾基礎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黨以及後來從其中分裂出來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則是農民社會主義者，其群眾基礎是農民。最初，布爾什維克的主張其實與孟什維克等黨派沒有根本區別，面對雙重政權並存的既成事實，他們仍舊囿於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因而工人階級不能奪取政權的陳舊教條，不敢越雷池半步。直到 4 月列寧回國後，才努力將這一傾向扭轉過來。最終布爾什維克在革

命開始以後採取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戰略，主張俄國無產階級應該且能夠掌握政權，能夠先於西歐無產階級掌握政權，揭開世界革命的序幕。布爾什維克將自己的主張概括為一句口號——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也就是說一切權力要交由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直接掌握。這一口號從最初的似乎只是脫離群眾的極少數人的夢囈，迅速地變成了千百萬工農的心聲。²

隨著事態的進展，群眾的情緒越來越激進，蘇維埃的力量也越來越強大。1917年6月，第一次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召開，全國各地的蘇維埃由此聯合為一個整體。在整個1917年的俄國，蘇維埃是惟一一個穩定的具有全國規模的民衆代表機構。此時，孟什維克等在蘇維埃繼續佔據多數，布爾什維克仍處於少數。不過僅僅一個月後，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就失去了耐心，自發地起來要求由蘇維埃獨自掌握政權。但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卻不與群眾站在一起，膽怯地拒絕了。

群眾逐漸對他們失望，轉而支持布爾什維克。在9月平定資產階級支持的科爾尼洛夫軍事叛亂後，群眾的力量迅速從因七月事件而遭受的短期挫折當中恢復起來，再次達至高峰。對孟什維克等妥協黨派失去耐心的群眾，紛紛將選票轉投給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逐漸在包括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內的多數地方蘇維埃中佔據了多數，並且還獲得了另一個左翼政黨——從社會革命黨內分裂出來的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支持，從而將這個多數地位鞏固

² 革命的主要內容並非是密謀暴動，而是爭取群眾：“必須承認這個事實，在大多數工人代表蘇維埃中我們黨處於少數地位……只要我們還是少數，我們就要進行批評，揭示錯誤，同時宣傳全部政權歸工人代表蘇維埃，使群眾從實際經驗中糾正自己的錯誤。只要我們是少數，我們就要進行批評，使群眾不再受騙。我們不希望群眾相信我們的諾言，我們不是江湖騙子。我們希望群眾從實際經驗中來糾正自己的錯誤。”《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133頁。

下來。對於掌握政權，群眾早已是迫不及待，現在，與其說是群眾在追隨布爾什維克，不如說是布爾什維克在追隨群眾。布爾什維克最終順乎民意，將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付諸實施。十月革命到來了。

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的指揮下，蘇維埃逐步將原屬於臨時政府的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臨時政府則徹底喪失了群眾基礎，成為孤家寡人。到1917年11月6日（俄曆10月24日），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召開的前一天，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開始進行推翻——準確地說是取締——臨時政府的最後行動。次日大會開幕時，政權被送交其手中。組織在蘇維埃內的、力量佔據絕對優勢的工人士兵群眾使革命以幾乎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布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在代表大會中佔據了絕對多數，於是蘇維埃大會宣佈“全部地方政權一律轉歸工兵農代表蘇維埃”，³開始直接行使權力。蘇維埃與立憲會議的衝突也隨即產生。

此時，除了自身所擁有的群眾基礎之外，蘇維埃更期望能得到即將召開的立憲會議的支持。二月革命後，經由全民普選產生的立憲會議來決定俄國的未來，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持。由於群眾情緒激進，資產階級害怕此時召開立憲會議不能產生滿意的結果，因此千方百計拖延立憲會議的選舉和召開。只是迫於壓力，直到8月份，臨時政府才決定於11月下旬進行立憲會議的選舉。結果選舉還未進行，蘇維埃就已經取得了政權。

由於不是全民組織，只是一個階級組織，無產階級和其他被剝削勞動人民的組織，蘇維埃希望全民性質的立憲會議能夠做出決定，批准由其行使權力的既成事實。也就是說，一個階級議會

³ 《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第6頁。

期望得到全民議會的批准，來進一步確立自己的合法性。蘇維埃組建政府人民委員會的時候，明確宣佈其只是“工農臨時政府，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前管理國家”。⁴

蘇維埃如期舉行了立憲會議的選舉。布爾什維克及其盟友左派社會革命黨沒能在選舉中獲得多數。這一結果並不令布爾什維克感到意外，因為俄國的大多數居民是農民，而且選舉人名單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制定，那時候社會革命黨和左派社會革命黨還沒有分裂，所以農民大都把選票投給了社會革命黨，結果社會革命黨在選舉中獲得了多數。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等反對革命的力量企圖借立憲會議來取締蘇維埃政權，剝奪無產階級的革命成果。

儘管布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處於少數，但是在城市地區布爾什維克獲得了絕對多數，也就是說獲得了絕大多數無產階級的支持，其競爭者孟什維克和敵對者資產階級政黨立憲民主黨都所獲甚微。另外在軍隊中布爾什維克也獲得了近半數的支持，尤其是在靠近中心地區的最重要的諸支軍隊中，布爾什維克都獲得了多數。也就是說，布爾什維克得到了群眾當中政治上最活躍的最有力量的那一部分的支持。十月革命的群眾基礎不容置疑，決不是許多人所稱的那樣是少數人的冒險。蘇維埃戰勝了立憲會議，無非再次表明了城市領導農村是現代社會的特徵。

1918年1月17日，立憲會議召開前一天，蘇維埃公佈了《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要求立憲會議“宣佈俄國為工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支持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否則將取締立憲會議。立憲會議召開後，拒絕了蘇維埃掌握全權的要求，要求一切權力歸立憲會議。蘇維埃則認為無產階級的利益高於一切，蘇維埃的

⁴《列寧全集》第33卷，第22頁。

地位高於立憲會議，既然立憲會議拒絕與蘇維埃合作，那麼只好解散立憲會議（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民主黨都支持這一點）。解散立憲會議後，立即召開了全俄第三次工兵農蘇維埃代表大會（此時原本獨立的農民代表蘇維埃也合併到全俄蘇維埃當中），布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在選舉中大獲全勝，其他政黨根本就微不足道（參與投票的蘇維埃選民的數量不詳，有資料稱可能佔立憲會議的一半左右，有的則認為更多）。大會再次重申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蘇維埃政權從此不再是臨時性質的了。

1918年7月，全俄第五次工兵農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新憲法，正式定國名為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俄（1922年改為蘇聯）。憲法剝奪了資產階級、地主和其他剝削階級成員的選舉權，選舉權成為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等“被剝削勞動人民”的特權。憲法對蘇維埃代表的選舉制度作了特殊規定，以有利於與農民相比居少數的工人階級能在蘇維埃中保持對農民的優勢。蘇維埃制度就這樣確立下來。

蘇維埃取代了立憲會議，蘇維埃憲政取代了立憲會議憲政，階級議會取代了全民議會，階級民主取代了全民民主，民主成為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特權。不過這一制度並非是俄國工人的首創，在資本主義國家被迫實行普選權之前，資產階級一直長期獨佔議會，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因納稅、財產、教育等限制而被剝奪了選舉權，那時的議會也是一個階級議會。既然如此，現在將俄國無產階級的行為稱作禮尚往來也未嘗不可。比如，1688年“光榮革命”後的將近兩百年，英國議會實際上一直就是一個地主資本家代表委員會，工農大眾被排除在外，深受其害。而現在的蘇維埃政權，則是工人農民代表委員會，將資本家地主排除在外。單就這一方面講，兩者的性質是相同的。正如同將工農大

衆排除在外的英國議會，在其內部地主資本家繼續保有民主一樣，將資本家地主排除在外的蘇維埃內部繼續保有民主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取締立憲會議後，在蘇維埃內部單憑自己就處於絕對多數地位的布爾什維克，當時並沒有也不願將民主與專政對立起來。蘇維埃政府成立十幾天後，由列寧執筆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宣言》宣稱：“在俄國，已經爭得了蘇維埃政權，因此政府由一個蘇維埃政黨轉到另一個蘇維埃政黨手裡，無須經過任何革命，只要通過蘇維埃的決議、蘇維埃代表的改選，就可以實現……我們過去同意，並且現在仍舊同意同蘇維埃中的少數派分掌政權，但這個少數派必須誠心誠意地服從多數，並執行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全體批准的，採取漸進的、而不是堅定不移的步驟走向社會主義的綱領”。⁵ 布爾什維克本來同意與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內的各社會主義黨派共同組成一個多黨聯合政府。但是已經處於少數地位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卻毫無自知之明，當初群眾自動將政權送到他們手中時，他們拒不接受，如今群眾拋開他們取得了政權，他們卻又認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了，他們向布爾什維克提出了過高的令其無法接受的條件——將列寧和托洛茨基排除在政府之外。無奈，布爾什維克最後只好拋開他們，與左派社會革命黨組成了兩黨聯合政府，不過孟什維克等諸多黨派作為在野黨繼續存在。由此看來，蘇俄的一黨制決非歷來如此，在初期實行的其實是多黨制基礎上的兩黨聯合執政。

此時，俄國無產階級不僅在政治領域，而且在經濟領域也表現出強烈的歷史主動精神。革命後蘇維埃政權並沒有立即對經濟進行國有化改造，但是資產階級卻以逃跑和怠工等方式與新政權

⁵ 《列寧全集》第33卷，第67~71頁。

進行對抗。工人群眾不等蘇維埃發佈命令，自己就起來直接接管和控制了所在的工廠和礦山等，開始對資產階級進行剝奪，開始成為自己所在的工作場所的主人。

無產階級享有民主，資產階級受到專政，對此時的蘇維埃制度來講可謂是名實相符，不像後來斯大林時期那樣，固然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了，但是對工人階級也毫無民主可言。因此，斷言取締立憲會議後，蘇維埃內部的民主也蕩然無存，這是毫無道理的，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在《論俄國革命》這部其生前並不願發表的著作中，盧森堡認為“列寧和托洛茨基用蘇維埃代替了根據普選產生的代議機構，認為蘇維埃是勞動群眾惟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陷於癱瘓”。⁶ 這樣的必然性並不存在。筆者認為，大概盧森堡當時對蘇維埃的歷史意義還缺乏足夠的認識，這從其著作中可以看出來。1918年德國11月革命開始後，按照俄國無產階級的榜樣，德國無產階級也組建了工人士兵代表委員會（即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此時盧森堡已轉變為蘇維埃制度最熱烈的擁護者：

“如果有人（即艾伯特考茨基們——引者註）對我們毀謗俄國布爾什維克，我們永遠不應忘記對此回答說：你們是從哪裡學會你們今天的革命的初步知識的呢？你們是從俄國人學來的：工人士兵委員會……是俄國革命為世界革命提出第一批口號的。我們有把握說——這是由整個情勢自然而然產生的——：在德國之後不管什麼國家爆發無產階級革命，它的第一個姿態也將是建立工人士兵委員會”。⁷

⁶ 《盧森堡文選》下冊，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03頁。

⁷ 《盧森堡文選》下冊，第545頁。

遺憾的是，盧森堡這方面的觀點通常都被人們忽略了。

講到德國，我們會發現，俄國革命中蘇維埃與立憲會議（國民議會）的衝突的具體形式並不具有普遍意義。如果革命不是發生在像俄國這樣一個無產階級在人口中佔少數的國家，而是換成德國這樣一個無產階級在人口中佔多數的國家，就會是另外一種情景。1918~1919年革命期間，德國無產階級完全可以做到先通過蘇維埃掌握政權，然後再獲得國民議會中多數的批准，這樣蘇維埃與立憲會議的對抗就不會產生了。

1918年11月革命推翻霍亨索倫王朝的統治後，德國無產階級立即組建了工人士兵代表委員會（即蘇維埃），開始掌握政權。臨時政府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這也是模仿俄國）的權力，直接來自工人士兵代表委員會的授權。德國此時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蘇維埃共和國了，一個不鞏固的蘇維埃共和國。德國革命開端階段所達到的高度其實超過了俄國革命，一上來就是蘇維埃單獨掌權，不存在蘇維埃與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並存的階段。但是把持著蘇維埃和人民委員會的社會民主黨，卻反其道而行之。艾伯特（社會民主黨主席）們並不敢公開反對蘇維埃，這樣做會立即被群眾拋棄。他們採取了另外一個戰略，那就是借全民性的立憲國民議會來否定階級性的蘇維埃。艾伯特們宣稱蘇維埃還缺乏足夠的合法性，只有經過國民議會的批准後才能最終獲得合法性；在獲得批准之前，蘇維埃應該自我剋制，自我約束，也就是自我取消；在國民議會召開之前，無產階級沒有繼續進行在議會外已開始了的直接行動的權利。這實際上是在壓制蘇維埃，要無產階級不顧資產階級在議會外的防禦和反撲而坐等國民議會的裁決。艾伯特們詭稱道，只有這樣才是遵從“民主”原則，否則就是圖謀少數人的“專政”，就是少數人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多數人。

此時無產階級的戰略應該是用議會外多數促成議會多數。這就要求無產階級能夠衝破艾伯特們的阻撓，將資產階級在議會外的力量完全剝奪，真正做到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無產階級將自己的強大力量和堅定意志完全展露出來後，會促使無產階級中剩餘的動搖分子和介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層轉變為蘇維埃的支持者，議會外的多數將轉化為議會多數。此時召開國民議會，不僅在議會外，而且在議會內，無產階級都將佔據多數，毫無疑問議會將會批准由蘇維埃行使權力的既成事實，“民主還是專政”的兩難選擇也就不會產生了。反之，如果無產階級在議會外與資產階級進行的爭奪中遭到失敗，國民議會將會是另外一種結果。由此可見，事實與艾伯特們的詭辯並不相同，德國面臨的選擇根本不是什麼“民主（即國民議會）還是專政？”，而是“無產階級主導的國民議會還是資產階級主導的國民議會？”，或者說是“蘇維埃主導的國民議會還是志願團主導的國民議會？”。

1919年1月事件解決了這一問題。1月事件中，冒險向柏林無產階級挑釁的艾伯特們，遭到了數十萬工人和士兵的武裝反擊，但是由於領導的失職，群眾的熱情被付諸東流。群眾垂頭喪氣四散回家後，艾伯特們則趁機勾結志願團進行反擊。形勢急轉直下，自十一月革命以來一直佔優勢的無產階級，被資產階級擊敗了。在反革命獲勝的氣氛下召開的國民議會，由志願團主導的國民議會，使資本主義在德國獲得了合法性。假如一月事件中不是志願團，而是柏林工人獲得勝利，那麼工人群眾主導的國民議會，必然會賦予蘇維埃德國合法性。志願團的成員後來構成了納粹衝鋒隊的核心，社會民主黨最終也自食其果，被自己所挽救和召喚的反革命勢力所摧毀。

另外，蘇維埃取締了立憲會議，拒絕了佔人口多數的農民的意願，但這並不是說蘇維埃不相信自己代表包括農民在內的多數人的利益，也不是說蘇維埃不願意去爭取這個多數的支持。最終，蘇維埃政權通過比立憲會議的投票更為曲折的方式贏得了農民的支持。

首先，取締立憲會議後，當時並沒有招致農民的反抗。農民雖然依然按照傳統投票支持社會革命黨，但是他們並沒有忘記，正是蘇維埃政權給了他們土地，而以農民政黨自居的社會革命黨在把持蘇維埃的時候卻不願意將之付諸實施。單憑這一點農民就不會敵視蘇維埃。

在俄國這樣一個農民佔據人口多數的國家，即使在無產階級已經在城市裡面戰勝了資產階級的情況下，“要小資產階級和半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預先（即通過投票——引者註）決定‘究竟是和工人階級一道走還是和資產階級一道走’這個極複雜的政治問題，那是根本不能想像的。非無產階級勞動階層發生動搖是必然的……只有在長久的殘酷的鬥爭中，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的沉痛經驗，才會引導他們對無產階級專政和資本家專政做出比較之後得出結論說：前者比後者好”。⁸

這一“沉痛經驗”是什麼呢？那就是後來的內戰。白軍的表現，地主資本家的表現，使農民甚至在蘇維埃政權對其實行餘糧收集制的情況下，最終還是選擇站在紅軍一邊，這是蘇維埃政權戰勝白匪叛亂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關鍵。當然，如果革命迅速在德國獲得成功，那麼內戰就不會爆發或者不會形成鉅大的規模，農民與蘇維埃政權的關係將會更加融洽。甚至可以推測，假如德國無產階級先於俄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而不是相反，那時俄國

⁸ 《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二版，第130~132頁。

召開的立憲會議也許將會做出支持蘇維埃的決定。

回顧蘇維埃的歷史之後，我們會發現“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不僅僅是一句簡單的口號，它更是對俄國革命的實際進程和內容的最恰當的概括。誰不理解蘇維埃，誰就不理解俄國革命。革命初期，稱俄國無產階級通過蘇維埃民主將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毫不為過。這一蘇維埃民主制有效運行的前提是蘇維埃的群眾基礎——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充滿活力，擁有充分的自主性和創造性。

現在我們不難做出判斷：取消立憲會議後，蘇維埃內部不僅沒有排斥民主，喪失民主，而且繼續保留民主，甚至將民主制昇華到一個新的高度。筆者在此嘗試著總結一下工人代表蘇維埃或工人代表委員會這一新型民主制度的特點。

前面已經指出，革命高潮期間出現的蘇維埃，極大地促進了無產階級的團結和統一。

與議會那樣的全民代表組織不同，蘇維埃只是一個階級性的代表組織，其成員只包括工人群眾，資產階級等被排除在外，因此可以將蘇維埃稱為工人議會。但是蘇維埃又避免了議會的諸多缺陷，使民主在廣度（由政治而經濟）上和深度（由間接而直接）上都得到了擴展，更加有利於群眾參與決策，更加符合古典民主的要求。

蘇維埃代表的選舉，不是按照地區，而是按照生產工作單位來進行，這既有利於明確蘇維埃的階級性，有利於加強選民之間和選民與代表之間的聯繫，同時又有利於蘇維埃通過其代表獲得對工廠、礦山、運輸、金融、交通、通信等機構進行直接控制的權力。

蘇維埃代表沒有固定任期，隨時可以罷免和更換。蘇維埃尤

其是地方蘇維埃的選舉是經常性的，這使蘇維埃能夠及時地反映群眾情緒的波動和變化。即使是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召開，在革命期間也是相當頻繁的，從1917年6月到1918年7月這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就達五次之多。

蘇維埃的出現形成了雙重政權並存的局面，蘇維埃將成為組織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行動的機構；推翻舊政權後，蘇維埃自然又變為工人階級進行自我統治和自我管理的機構。同時蘇維埃的民主性使其成為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保障。蘇維埃容納了所有的工人政黨，是各政黨影響廣大工人的最好渠道，不管是革命中還是革命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各黨派工人之間的分歧都可以通過民主方式在蘇維埃內部解決。斯大林官僚統治的歷史更進一步表明，蘇維埃民主還是防止官僚蜕化所必需的。

與直接佔有社會資源的資產階級不同，無產階級不運用蘇維埃這樣的更廣泛、更直接、更徹底的民主形式，就不能對政治經濟領域實行自我管理、自我統治。即使在這樣一個國家，無產階級已經通過獲得議會多數開始執政，也就是說已經獲得了合法性，那麼這也並不能解決根本問題，隨之必將面臨擊敗資產階級的叛亂和剝奪資產階級財產的挑戰（想想佛朗哥、多爾富斯、蘇哈托、皮諾切特的這些例子吧）。單憑議會手段絕不可能解決這些難題，必須依靠群眾的直接行動，而徹底發動群眾必然導致成立蘇維埃，權力重心此時也將由議會轉到蘇維埃手中。殊途同歸，要想完成無產階級的徹底解放，最終必然需要走上蘇維埃的道路。如盧森堡所言，“只有這樣才是社會主義，只有這樣才能實行社會主義”。⁹ 手段與目的在此是合而為一的。當然，在實踐中並不需要完全拘泥於蘇維埃這一形式或名稱，關鍵是要認清它所體現的

⁹ 《盧森堡文選》下冊，第551頁。

實質。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道路，大致可以分如下三種情況。第一，蘇維埃先掌權，遭到國民議會反對，蘇維埃推翻國民議會自行執政（如俄國革命）；第二，蘇維埃先掌權，國民議會再加以追認、批准；第三，無產階級先控制國民議會，進而再組建蘇維埃擊敗資產階級的叛亂，對社會進行全面自我管理。

可以說，蘇維埃制度，工人代表委員會制度，是俄國無產階級對人類文明最偉大的貢獻。人類要想擺脫資本和權力所施加的奴役，蘇維埃、工人代表委員會是惟一的途徑。

順便說一下，通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那種在俄國革命與集中的先鋒隊理論之間劃等號的觀點儘管被普遍接受，但其實是毫無歷史依據的。首先，所謂的集中的先鋒隊理論並不存在，至多可以說只是在短期內並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存在過。¹⁰ 其次，革命期間布爾什維克本身與單純集中就沾不上邊，從2~10月，布爾什維克內部就革命的性質與前景、是否奪權、如何奪權、何時奪權等問題一直爭執不休，集中從何談起？布爾什維克與工人群眾之間的關係更與集中沾不上邊，面對獨立的有組織的群眾運動，布爾什維克要想領導群眾——具體表現為在蘇維埃內佔據多數，首先就要贏得群眾的支持，單純依賴所謂的集中能夠贏得群眾的支持嗎？單純依賴集中能夠將已經贏得的群眾支持長期維持下去嗎？與通常的看法相反，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根本區別並非是組織原則，而是政治原則，布爾什維克是依靠其革命綱領——最堅決地促進工人階級的自我組織、自我解放——才贏得群眾的支持的，而這一綱領的形成又是布爾什維克內部爭論而非內部集中的結果。除了群眾基礎這一前提，合格的革命領導對無產階級革

¹⁰ 厄奈斯特·曼德爾：〈列寧是包辦代替主義的根源嗎？〉《權力與貨幣——馬克思主義的官僚理論》第三章第三節，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140~144頁。

命的最終勝利是不可或缺的，不過請大家注意，合格的革命領導並不在於是否集中，而在於是推動群眾前進還是阻撓群眾前進。事實與那種在集中與革命性之間劃等號的觀點相反，後來斯大林時代的各黨的確是無比集中了，但是他們卻常常採取一條阻撓革命深入的路線，而非促進革命的路線。

在就蘇維埃與立憲會議的衝突得出結論後，現在新的問題又產生了。俄國革命的蘇維埃時代，與後來斯大林主義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官僚專制統治可謂是判若天淵。那麼，俄國革命是如何從其蘇維埃民主時代一步步地蛻化為後來的官僚統治呢？這一歷史進程是如何展開並完成的呢？

在此筆者只是簡單地給出答案（詳細論述見拙文《論俄國革命——從興起、蛻化到垮臺》）。如剛才所述，答案肯定不是什麼布爾什維克的“集中的先鋒隊理論”所致，也不是如時下流行的那種淺薄的經濟決定論所言：終結資本主義就是“通向奴役之路”，這種觀點從來就沒能在自己所斷言的因果之間用歷史事實聯繫起來，所謂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倒是完全適用於這種觀點。

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充滿活力，擁有充分的自主性和創造性，這是蘇維埃民主正常運轉的社會基礎。因此，當這種狀態不復存在時，當無產階級逐漸陷入消極、被動和冷漠之中，而不再像革命初期那樣積極、主動和充滿活力時，蘇維埃民主也就難以維繫了。一部俄國革命的蛻化史首先應該被看作是一部俄國無產階級力量衰落的歷史，一部俄國無產階級逐漸退出政治前臺的歷史。那麼無產階級衰落的根源又是什麼呢？根源就是由於革命缺乏國際援助而陷入了長期的孤立。孤立使內戰空前慘烈並持續數年。到1921年，無產階級儘管贏得了內戰，但是其力量也被耗盡，而

且孤立也未能被打破，使無產階級得以恢復力量的國際援助未能到來。被壓垮的無產階級，此時無力繼續維持蘇維埃民主的運轉。面對困境，布爾什維克做出了錯誤的決定，他們沒有將盡全力促進無產階級力量的全面復興作為根本對策，反而企圖通過越過蘇維埃直接代替無產階級行使權力這一臨時措施，也就是說用取締其他蘇維埃政黨、用布爾什維克一黨專政代替蘇維埃民主的辦法，來渡過難關。一黨制下的蘇維埃已名存實亡。布爾什維克為防止自己變成蘇維埃的代替物，又取消了本黨內部的民主。不幸的是，事與願違。取消蘇維埃民主和黨內民主後，先是使無產階級退出了政治舞臺，進而官僚集團——以斯大林為首的書記階層，這一階層過去並不存在——在黨內產生並迅速崛起，力圖將所有權力攫取到自己手中。最終，官僚集團擊敗了黨——被以黨自居的官僚稱作反對派——的抗爭，將黨吞噬。這就是俄國革命從蘇維埃民主時代蛻化為斯大林官僚統治的簡要過程。如果1919年德國革命沒有失敗，那麼俄國革命將朝另一個方向發展，蛻化將不會發生，蘇維埃民主將進一步得到鞏固，成為一條使人類免遭資本與權力的奴役的自由之路。